

# 傅雷译巴尔扎克名作集

---

欧也妮·葛朗台  
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

I



傅敏 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出版说明

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,人名、地名与现在通用的译名不尽一致;有些地方用词和标点符号也多有与现代汉语不相符之处。在此次出版时,编者傅敏先生除对部分作品进行修改外,大部分仍因原译,特此说明。

### 傅雷译巴尔扎克名作集

傅 敏 编

责任编辑 王 豪 赵增起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中科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9.5 字数:1700千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0000册

---

ISBN7-215-04187-5/I·533 定价(共六卷):150元

## 代总序

### 傅雷与巴尔扎克

自从中西文化交流以来，我国译坛产生过不少知名的翻译家，但以译著宏富、译笔优美而言，则当推傅雷先生为个中翘楚。傅雷先生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，其中尤以巴尔扎克及罗曼·罗兰的作品为骨干。两者相较，傅译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固然为传诵一时的名作，但若质量并论，则不得不承认巴尔扎克的作品，才是傅译浩瀚天地中的重镇。

傅雷全部译作三十多部，约计五百万言，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，共占十五部之多。除了《猫儿打球号》一书译稿在文革中遗失之外，其他出版的十四部作品，包括脍炙人口的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幻灭》《贝姨》等，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，几乎再没有人想起原著是用法文写成的了。巴尔扎克的作品于一九一五年经林纾译介以《哀吹录》为名，首次传入中国，以后辗转蒙尘数十载，直至一九四六年，傅雷出版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时，才得以洗炼畅顺的真面目，与中国读者相见！从此之后，傅雷与巴尔扎克，译者与作者之间，密切相连，结下不解之缘，达二十年之久！

要了解傅雷何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选择巴尔扎克的作品为翻译对象，我们可以从作者与译者的性情、气质，对生命、文学的看法，对工作的态度与习惯等各方面，来分析研究。

一般人译书，不是受人所托，情面难却；就是利之所在，粗制滥造。真正为兴趣而翻译的，少之又少。即使为某一部作品所动而着手翻译时，也往往不肯多下功夫，对原著固然没有什么研究，对作者更谈不上什么了解。严谨的翻译家如傅雷，当然极不相同。傅雷选择每一部作品都是很有原则的，我们且看他在《翻译经验点滴》中的一段话：

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：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，那就不必勉强；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，甚至相见恨晚。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，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。……

因此，我深深的感到：（一）从文学的类别来说，译书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，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，不会做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……（二）从文学的派别来说，我们得弄清楚自己最适宜于哪一派：浪漫派还是古典派？写实派还是现代派？每一派中又是哪几个作家？同一作家又是哪几部作品？……

傅雷毕生精力所致，有一半倾注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之上，显然在精神意识上，已经超越时空，把巴氏引为气味相投的挚友知己了。然而傅雷秉性孤傲倔强，严谨刚直，巴尔扎克则一生放浪形骸，洒脱不羁，一般人也可能会问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，又如何会在精神上紧密连系，一生一后在法、中文坛上开创出艳丽的奇葩来呢？甚至傅聪有一次与笔者闲谈时，也有同样的疑问。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在性情气质上，应该跟罗曼·罗兰比较接近，而并非与巴尔扎克息息相通。其实，抛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与不羁，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、毅力、自律与执著；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与含蓄，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与狂热。傅雷个性外冷内热，正适合翻译巴尔扎克这位写实派大师气势磅礴，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。

傅雷认为“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，自然牵涉到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历史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音乐，以至天文地理、医卜

星相，无所不包。”（《翻译经验点滴》）而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，正是包括两千多个人物，个个栩栩如生；涉略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风俗史，事事巨细兼备的宏篇伟制。这样的作品，无论在规模体制或写作手法上，都恰好符合傅雷对文学的看法。

傅雷在写给好友林以亮的几封信中<sup>①</sup>曾经批评过几位作家的作品，认为不适合自己的翻译：“我个人是认为 Austen 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，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，以我们对 Art 的眼光来说，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。”（傅雷致林以亮书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）他又说：“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，觉得不对劲，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，布尔乔亚俗套谈情说爱的玩艺儿，看来不但怪腻的，简直有些讨厌。”（傅致林书，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）他甚至认为“罗曼·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，我早已头疼。此次重译，大半是为了吃饭，不是为了爱好。”<sup>②</sup>（傅致林书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）在傅雷的心目中，中、西文学之间是有隔膜存在的：“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西洋人的出入很大，无论读哪个时代的西洋作品，总有一部分内容格格不入。”因此，就算是同为现实主义巨匠的史当达，傅雷也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史当达，我还是二十年前念过几本，似乎没有多大缘份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已提议要我译《红与黑》，一时不想接受。”（傅致林书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）从这些片段看来，我们大可以确定，傅雷之所以连续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，除了种种外在客观的因素之外，主要是因为译者与作者之间，实在投缘，否则以傅雷刚直不阿的性格，绝不会仅仅为了随俗而乐此不疲的。傅雷在一九五四年宣称：“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，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《巴尔扎克选集》的总名，种数不拘，由我定。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，大概在十余种。”（傅致林书，一九五四年

① 傅雷曾经写给林以亮多封有关文学、翻译的函件，这批函件除其中一封之外，从未曾公开披露，故弥足珍贵，此处承蒙林以亮先生允准转录，特此致谢。

② 傅雷于一九五二年开始重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化了一年多功夫，把旧作改得体无完肤。译完后并决定把初译本全部烧毁。（见傅致林书，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）可见，虽不是为了爱好，翻译态度仍是极其认真的。

七月八日)可惜一九五四年后,傅雷只重译了《高老头》,新译了七部巴尔扎克的作品,就与世长辞了。这七部译作中,有一部正如前文所述,在文革中遗失,有两部还是迟至一九七八年才初次出版呢!巴尔扎克生前立志要完成《人间喜剧》的辉煌巨构,包括的书名篇名达一百四十三本之多,其后完成的作品有九十余册。作者与译者,由于命运播弄,都是壮志未酬,实在令人唏嘘不已!

傅雷与巴尔扎克,虽然性情相近,对文学的看法一致,令傅雷选择巴尔扎克为终身致力的对象,但是事实上傅雷是否适合翻译巴氏的作品,除了主观的喜好之外,却又牵涉到许多客观的条件。对于这一点,傅雷自己也很清楚。他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,有一个适应的阶段,而测验“适应”的尺度,除了对原作热爱之外,还得具备艺术的眼光,因为“没有相当的识见,很可能自以为适应,而实际只是一厢情愿。”(《翻译经验点滴》)傅雷认为作为一个称职的文学翻译家,必须具备各方面的条件,尤其是人生经验必须丰富多姿,否则难以了解一部作品的精妙之处。“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。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,广泛涉猎以外,还得训练我们观察、感受、想象的能力;平时要深入生活,了解人,关心人,关心一切,才能亦步亦趋的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,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。”(《翻译经验点滴》)我们且看傅雷一生的经历,就知道他在才情、学养等方面,足以担当巴尔扎克的代言人而无愧了!

傅雷早岁留学法国,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,在巴黎度过整整四个年头。当年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,一面在罗浮美术史学院学习。正如所有的年轻学子一般,在课余之暇,时常寻幽探胜,而放假期间,更喜欢出门远游,四处浏览。

巴黎这名城,的确有其不同凡响之处,任何在巴黎耽过的人,都会不知不觉受它感染而眷恋不舍。巴黎的艺术气氛,巴黎的浪漫情调,巴黎的历史胜迹与妩媚景致,都是历久弥新的。巴尔扎克写作的时代是如此,傅雷留学的时代是如此,而今时今日,亦依然如此!傅雷热爱巴黎,当年负笈之地的一景一物,在其回国后数十年

间，依然念念不忘，心驰神往！我们且看傅雷于一九六二年写给儿媳弥拉信中的这一段剖白：

“看到你描绘参观罗浮宫的片段，我为之激动不已，我曾经在这座伟大的博物馆中，为学习与欣赏而消磨过无数时光。得知往日熏黑蒙尘的蒙娜丽莎像，如今经过科学的清理，已经焕然一新，真是一大喜讯。我多么喜爱从香榭丽舍大道一端的协和广场直达凯旋门的这段全景！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桥上的夜色，尤其是电灯与煤气灯光相互交织在塞纳河上形成瑰丽的倒影，水中波光粼粼，白色与瑰色相间（电灯光与煤气光），我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桥上，绝不会不尽情浏览。告诉我，孩子，当地是否风光依旧？”（《傅雷家书》，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，译自法文。）<sup>①</sup>

不错，巴黎的点点滴滴，已经渗入傅雷的心坎深处，一生一世也不能忘怀。这种感受与经历，绝不是从未涉足巴黎的人可以凭空臆想得到，也不是徒靠书籍图片，可以具体学习得来的。因此，由傅雷来翻译法国文学，尤其是巴尔扎克的作品，的确是最恰当不过！

巴尔扎克一生正好经历十九世纪的上半叶，自一八一四年冬天起，来到巴黎定居，其后就在巴黎长大成人，接受教育，历经艰苦而终至扬名于世，写出了卷帙浩繁的《人间喜剧》。可以说，巴黎是孕育作家的温床，而作家大部分的篇章，也是直接、间接以巴黎为场景的。巴尔扎克对巴黎的描绘，精致入微，无论是一个地区，一条街道，一幢建筑或一间房间，每每都长篇累牍，不厌其详的细勾慢描，仿佛是一幅用力深厚的工笔画。这种功夫，若非对巴黎极有认识，对建筑艺术极有心得的译者，是绝对无法演绎出来的。

傅雷翻译的十五部巴尔扎克作品中，有十部是以巴黎为背景的，其中罗列的大街小巷、巨宅陋屋、历史古迹、园林胜地等，多至

① 《傅雷家书》增补本最近在北京出版，其中包括傅雷英、法文信共二十三封。

不可胜数,可是这一切都难不倒这位阅历深广、观察入微的翻译家!我们且看《高老头》中描绘的拉丁区、巴黎大学、卢森堡公园等书中主角拉斯蒂涅经常往返的地方,都正是傅雷当年甫抵巴黎的停居之地。“我们住的是第五区,有名的学生区域。巴黎大学的文科理科都在这区内”,傅雷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《法航通信》中兴致勃勃的报导着。“抵巴第二日,就逢星期,饭后郑君陪我去逛了一次 Jardin Lu embourg……以后每逢饭后未到大学校上课的时间,他们总是在那边散步的……我也常跟着他们……今早乘便独自去绕了一转,在静默中得有思索观察的余暇,不觉受到了不少的感触。”(《法航通信》之十五,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)可见傅雷从年轻时代起已经敏锐善感,且长于观察了。由于有了切身经验,在翻译起巴尔扎克笔下的景致人物,以及情景交融的片段时,便显得格外贴妥传神!

除了巴黎以外,傅雷亦曾在留法期间,到过其他大城小镇以及比利时、瑞士、意大利等国游历。他曾经写道:“一九二九年夏,我在日内瓦湖的西端,Villeneuve 对面,半属法国半属瑞士的小村落 St. Gingolphe 住过三个月,天天看到白峰上的皑皑积雪。”(《傅雷家书》,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,译自法文),又说:“瑞士和意大利的湖泊都在高原上,真正是山高水深,非他处所及,再加人工修饰,古迹林立,令人缅怀以往,更加徘徊不忍去。”(《家书》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四日)由此可见,傅雷对法国、瑞士、意大利一带的湖光山色,是如何的魂牵梦萦,长念心头!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第一部巴尔扎克译作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中,就有这么一段,描述两个年轻人于一八二三年七月结伴赴瑞士游历:“吕赛纳到弗吕伦途中的环湖风景,千变万化,凡是最苛求的幻想所期望于高山的,大河的,湖泊的,巉岩的,幽溪的,绿草的,丛树的,急流的,无不具备。”译文婉约生动,读来几乎令人以为是傅雷自己的游记,而不是翻译。论者往往称道傅译与原文神似,这种神似,得来岂是偶然的?

巴尔扎克除了喜欢对作品中的景物描绘入微之外,也喜欢在叙事中加插长篇累牍的章节,详论形形色色的专题,傅雷兴趣广

泛，常识丰富，在音乐、艺术、文字、哲学等各方面的素养，有目共睹，从《傅雷家书》中可以反映出来，因此译起巴尔扎克来，简直是得其所哉，挥洒自如。试问没有音乐艺术方面的学术与爱好，又怎能译得出《邦斯舅舅》中收藏家邦斯与音乐家许谟克这一对患难之交的言行举止呢？

傅雷译巴尔扎克，既然在主观爱好与客观条件上都配合得宜，自然得心应手，远胜其他译者了。但是傅雷对自己翻译巴尔扎克，又有什么评价呢？他曾经说过：“我的经验，译巴尔扎克，虽不注意原作风格，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。只要笔锋常带情感，文章有气势，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。”（傅致林书，年份佚，十月九日）反之，谈到译服尔德的《老实人》时，却说：“此书文笔简洁古朴，我犹豫了半年，不敢动手。现在试试看，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。”（傅致林书，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）看来傅雷本人对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是较有信心的。但是这种信心，是经历多年磨练才建立起来的。我们追溯傅雷的翻译生涯，就可以知道，正如巴尔扎克在文坛上的地位并非一步登天一般，傅雷在译坛上的成就，亦非一蹴而成的。早在留法期间，傅雷就已开始尝试翻译，动手译过梅里美和都德的几部小说，但没有投稿。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间，几部译作都遭退回，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出版第一部译作《夏洛外传》，却还是由“自己”出版社出版的。其后在一九三五年，傅雷译了一篇安德烈·莫洛亚写的《因了巴尔扎克先生底过失》，刊载在中法大学的刊物上。从这篇早期的译作来看，傅雷当时的翻译的确仍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他自己日后诟病的种种缺点，往往都可以在这篇译文中找得出来，与他成熟时期的作品相较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！

据傅雷自己说，远在一九三八年已经开始打巴尔扎克的主意，可是迟至一九四四年才动手翻译第一部巴尔扎克的小说，一九四六年才正式出版，这一段酝酿期不可谓不长。事实上，傅雷之所以有伟大成就，主要是由于工作态度审慎严谨，准备功夫充分周详所

致，我们观察他翻译一部巴尔扎克作品的过程，就可以得知他全部翻译生涯的勤奋与艰辛了。

傅雷在决定每年翻译一本巴尔扎克的作品之后，仍然要为选择哪部原作，如何搜购良好版本及参考资料而煞费思量。这种苦心，这种努力，几乎是周而复始，年年不断的。

当时在国内买不到上好的法文原版书及参考资料，傅雷只有靠海外的亲戚朋友到港、日、伦敦、巴黎等大小书店及旧书摊去搜罗，而在欧洲搜得的书籍，又往往要通达苏联才能辗转寄到。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手，这种精神食粮对傅雷是不可短缺的，其重要性并不下于真正的粮食！傅雷在一封给弥拉的信中<sup>①</sup>曾向姻亲曼奴轩转致谢忱，因为收到对方自巴黎寄来的六册书籍：（一）《巴尔扎克书信集》，（二）《巴尔扎克年刊》，（三）《人间喜剧人物辞典》共两册；（四）《法文成语字典》，（五）《引文百科全书》（《家书》，一九六一年，四月十九日，译自英文）。由这封信中，我们可以知道傅雷当时虽然身在中国，但对国外巴学的动态与发展，却了若指掌。六册参考资料中，《人间喜剧人物辞典》一书由费尔南·洛特所编，是研究巴尔扎克作品的必备要典；而《巴尔扎克年刊》更是国际知名的巴学权威杂志，一九六〇年才以全新面貌初次出版，而傅雷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已经搜罗到手了。<sup>②</sup>然而，这些书籍，只不过是傅雷搜罗资料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因为他在一九六三年做过研究工作，发觉一九四〇年后，“一共出版了四千多种有关巴尔扎克的传记、书评、作品研究……我不能不挑出几十种最有分量的，托巴黎友人代买。”<sup>③</sup>（《家书》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）由此可见，当年傅雷为翻译巴尔扎克，的确是化费不少时间与心血的。

① 此信原为英文，从未曾公开披露，承蒙傅敏惠赐原件影印本，特此致谢。

② 此后傅雷继续订阅《巴尔扎克年刊》，并于一九六三年成为“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”，可惜自一九六六年傅雷逝世之后，该会曾经清理过一次名册，凡不交会费的会员册名，都已删除，故笔者在巴黎研究期间，在该会无法查得当年傅雷有关资料。

③ 巴黎友人中与傅雷相交最深的就是名汉学家 Etiemble。

着手翻译之前，必须要把原著精读四五遍，全部细节内容，凡有不太理解的地方，一定到处向人求教，非到把握十足，绝不罢手。这种步骤，几乎已经成为翻译界人人耳熟能详的掌故了，此处不必再赘。有趣的是傅雷在着手翻译之前，为了确切了解巴尔扎克笔下描绘的情景，往往有先画草图的习惯：“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，主人翁住的屋子，不是先画一张草图，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。”（《翻译经验点滴》）但是这种习惯却是无独有偶的。在巴黎北部名叫香迪伊（Ghantilly）的城中，有一座国立图书馆，里面珍藏着收藏家罗旺茹尔子爵（Spoelberch de Lovenjoul）当年苦心收集得来的巴尔扎克手稿，只开放给专研巴尔扎克的学者专家参阅。笔者于一九八二年夏有幸得睹巴尔扎克各种手稿，在其名著《幻灭》的扉页，就赫然发现有张草图，上面画着书中女主角巴日东夫人的府邸。傅雷与巴尔扎克这种不谋而合的工作习惯，岂非又一次证明两人之间超越时空的灵犀相通！

作者百年前写作，译者百年后翻译，巴尔扎克与傅雷两人工作起来，都是日以继夜，无止无休的。每当创作的高潮，就同样闭门谢客，足不出户。巴尔扎克认为艺术家是孤寂的，往往身不由己，在冥冥中受制于一种任性的力量。傅雷也深深体会这种滋味：“人类有史以来，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，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，艺术家固然可怜，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，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。”（《家书》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译自英文）就是这种悲天悯人、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，使作者当年孜孜不倦的写，译者后来勤勤恳恳的译。

我们且看两位有艺术良知的大师是怎样工作的。巴尔扎克当年除了每天笔不停挥的写作之外，还需同时批改清样，修饰草稿。他的原稿纸张特大，初稿往往给修改得斑斑驳驳，无法辨认，是当时排字工人的噩梦！傅雷的译作从初稿到定稿，起码要修改六七遍以上。名译《高老头》更是经历三次重译，每次都改得体无完肤，最后一次甚至在定稿排版后，还大改特改一番。傅雷在印刷所中，也同样是恶名远播的！译者正如作者一般，每天常工作十余小时，把

好几件事情并在一起来做：“Cousine Bette 初版与 Eugenie Grandet 重版均在看校样，三天两头都有送来，而且每次校，还看出文字的毛病，大改特改（大概这一次的排字工友是头痛的）。同时，《高老头》重译之后，早已誊好，而在重读一遍时又要大改特改：几件工作并在一起，连看旁的书的时间都没有，晚上常常要弄到十二点。此种辛苦与紧张，可说生平仅有，结果仍是未能满意，真叫做‘徒呼奈何’！”（傅致林书，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）正如巴尔扎克一般，傅雷对自己的工作是精益求精，永不自满的。至于傅雷如何一一翻译十五部巴尔扎克的作品，足可以成为另一专文的题材，此处不赘。

傅雷除了工作习惯与原作者相似之外，日常生活言行，亦不知不觉中，深受巴尔扎克影响。从《傅雷家书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傅雷时常提到巴尔扎克来慰勉或告诫子媳。例如建议傅聪与弥拉阅读巴尔扎克的《奥诺丽娜》，并以此为诫，不要重蹈书中人感情纠葛的覆辙；提醒两人撙节用度，切忌浪费，因为巴尔扎克一世为债所逼，深受贫困之苦；指点傅聪如何立身处世，慎防奸邪，避开如《邦斯舅舅》中西卜太太之流的小人等等。从来都有人说起，要翻译成功，必须吃透原著精神，但像傅雷与巴尔扎克这样，译者与作者之间如此精神相通，契合无间的，恐怕并不多见。傅雷曾经说过：“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，挖掘灵魂的探险家，悲天悯人的宗教家，热情如沸的革命家；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，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，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，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。”（《翻译经验点滴》）假如巴尔扎克是这样一位理想的文学家，那么，傅雷就是他最佳的代言人了。作家与译者珠联璧合，原著与译作先后辉映，诚然是翻译史上难得一见的佳话！

金圣华

一九八四年

## 代总序

### 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心路历程

中国文坛上，不少名闻遐迩的作者，在创作之余，也曾手执译笔，译出影响深远的经典名著，例如卞之琳译莎士比亚、冰心译泰戈尔、老舍译萧伯纳、鲁迅译厨川白村、茅盾译左拉、巴金译屠格涅夫等，不胜枚举。

正如一群放舟中流的雅士，在饱览湖光山色之际，偶尔也会系舟岸边，拾级而上，徜徉遨游于湖畔的丛林之中。

雅士在湖上寻章摘句，吟哦推敲，他们健笔挥洒的经历，时常成为日后不少学者专家致力探讨的研究专题；可是这些雅士一旦系舟登岸，涉足译林，哪怕曾经字斟句酌、苦心经营，其逶迤曲折的内心世界，却往往鲜有论者涉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？一个现成解释是，创作与翻译在作家的文学生涯中有主从之分，翻译既非主流，自然不是论者的话题了。

然而，我们进一步探究，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自从中西文化交流以来，我国译坛曾经产生过不少毕生奉献译事的名家，如梁实秋、朱生豪、杨宪益、傅雷等。他们尽管译著宏富，贡献丰伟，但是一般读者仅知欣赏他们努力耕耘的成果，不知体会他们当年殷勤灌溉的艰辛！

其实，一部经典名作的翻译，从选材、研读等筹备功夫，到开始

动笔、揣摩原义、推敲文字等短兵相接的层面，以致初稿完成后修饰润色的定稿阶段，其间的过程，绵长而孤寂，原著往往动辄数十万言，译者若非痛下决心、锲而不舍，在漫漫译途上屡遭险阻而始终勇往直前，则绝难成事。

翻译名家在从事严肃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心路历程，于是就成为当今日渐发展的翻译学领域中，一块久遭荒弃、但不容忽视的未垦土。

本文欲就法国文学翻译名家傅雷先生毕生献身译事、与巴尔扎克结下不解之缘达二十年之久的过程中，从译者的性情、气质、文学修养、工作态度等各方面来分析译者翻译巴尔扎克的心路历程。傅雷的洋洋译著，就如一座富丽堂皇的舞台，在观众眼前搬演着巴尔扎克多姿多采的“人间喜剧”；而傅雷致傅聪的家书，以及大批至今尚未正式出版的书信<sup>①</sup>，则好比“闲人免进”的后台，这一批珍贵的资料，披露了译者选译巴尔扎克作品的内情、翻译之前的准备、翻译过程的甘苦，以及对译作完成后的自我评价等。一般论者以为傅雷高傲狷介，把自己的译作视为禁区，不肯让编者更改一字一辞，其实，傅雷之成为译坛楷模，自有其因由；而其在我国翻译史中赢取的盛名，更绝非幸致。

## 二

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，以译介欧西文学名著为己任。在所完成的五百余万言、共三十多部的译作之中，巴尔扎克的作品占十五部之多<sup>②</sup>，而这些作品之中，如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贝姨》《幻灭》等小说，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，深入民间，其影响力之深远，就如以中文创作的名著一般。

① 本文所采用的一手资料，如傅雷致友人宋淇、刘抗的信件、傅雷致出版社的信件等，大部分至今尚未正式出版。

② 傅雷所译的十五部巴尔扎克作品中，最后一部在文革中佚失，故实际发表的共为十四部。

傅雷可说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代言人，他怀着虔敬之心，以诚挚审慎的态度，孜孜矻矻、勤勤恳恳，将法国大文豪的代表作，一部又一部的译介过来，使其在中国读者群中广为流传。

傅雷为什么对巴尔扎克推崇备至，用力特深？是因为作者与译者性情相近、意气相投？还是因为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气候使然，使译者不得不以巴氏作为选译的对象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从傅雷的生平背景，窥见端倪。

傅雷四岁丧父，同年弟妹夭亡，因而自幼与寡母相依为命。母亲因望子成龙，对傅雷管教极严，在傅雷七岁那年，延请老贡生课读四书五经，为其打下古文基础，同时并聘请老师教授英文及算术。其后，傅雷进入小学、中学，由十三岁起念过三年法文，至十九岁自费赴法留学。

傅雷自十七岁起已经尝试写短篇小说，先后发表于《北新周刊》及《小说世界》等期刊，在赴法途中所写《法航通信》十五篇，发表于《贡献旬刊》，后为曹聚仁推重，编入《名家书信集》中。由此可见，傅雷自年轻时即表现出文学才华，这一点，与巴尔扎克不谋而合。

傅雷为什么从不从事创作，而走上翻译之途呢？原因是傅雷赴法之初，法文根基并不扎实，由于幼承庭训，律己甚严，为了加强语文能力，就开始试译法文作品，作为训练。傅雷在此阶段翻译了都德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《嘉尔曼》，均未投稿。一九二九年九月所译的《圣扬乔夫的传说》，于次年刊载于《华胥社文艺论集》，可说是最早发表的译作。

在法国四年，傅雷除学习法文、尝试翻译之外，还结交了不少日后成为大画家的好友如刘抗、刘海粟等。傅雷一面在梭邦艺术讲座听讲及在罗浮美术史学院学习，一面在课余又与友好经常结伴巡回于各大艺术博物馆，观摩及研究美术大师的不朽名作，因而在艺术欣赏的眼光及艺术批评的境界上，均大有所进。

一九三一年秋，傅雷与刘海粟结伴返国，当时胸怀大志，立意要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。谁知中国正值多事之秋，而傅雷秉性耿

直，嫉恶如仇，往往不能见容于黑幕重重的社会，所以他受聘于上海美专，不到一年，即辞职不干；其后，他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担任实务，也往往不超过半年，即挂冠求去，宁愿从纷扰不安的外界，退回宁静安怡的书斋，以著述及翻译为乐。

傅雷年轻时代翻译些什么书？他主要接触的是罗曼·罗兰及莫洛阿的作品，从二十八岁到三十三岁，曾以五年时间，译竣出版罗曼·罗兰的名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四大卷，在中国有良知、有热情的知识分子之中，引起了巨大的回响。

根据傅雷自己所说，远在一九三八年已经开始打巴尔扎克的主意，可是迟至一九四四年，才动手翻译第一部巴尔扎克的小说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，至一九四六年译竣出版。这一段酝酿期，前后经历八年之久，的确可说是相当长久。

傅雷为什么对巴尔扎克的作品，不译则已，一译就锲而不舍的继续下去？原因可能有二：其一，傅雷年轻时自认为气质与罗曼·罗兰最为接近，故翻译时易于下笔，这一点，到了一九五四年重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时，已经有不同的体会<sup>①</sup>。其二，傅雷工作态度审慎认真，动手翻译一部名著之前，必先详加研究、充分准备不可。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大师，巴氏在法国文坛的地位，当远远超过罗曼·罗兰及莫洛阿，而有关巴氏的研究资料，浩如烟海，在法国已经形成为“巴学”，其波澜壮阔之处，与我国红学相较，实不遑多让。傅雷治学严谨，对巴氏作品不敢贸然翻译，但一旦开始，即发现其内蕴丰富，兴味无穷，因此就继续钻研下去，欲罢不能了。

傅雷一开始接触巴尔扎克，就全情投入，悉力以赴。这多多少少与傅雷刚烈炽热的个性有关，根据傅聪、傅敏的回忆，他们从小就对巴尔扎克的名字耳熟能详。一九四四年四月，傅雷刚译完第一部巴尔扎克的小说，就在以“迅雨”为笔名发表的《论张爱玲小说》

① 傅雷在致宋淇信中说：“罗曼·罗兰一套新浪漫气息，我早已头痛。此次重译，大半是为了吃饭，不是为了爱好。”（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）

一文中，特别提到了这位作家：“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。……其实，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。哪一种主义也好，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，真实的生活体验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，熟练的文字技能，活泼丰富的想象，决不能产生一件像样的作品。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。……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，要装成十余巨册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。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，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。”<sup>①</sup> 傅雷在同文结论中说：“小说家最大的秘密，在能跟着创作的人物同时演化，……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，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、那么广的，他也不是对贵族、平民、劳工、富商、律师、诗人、画家、荡妇、老处女、军人……那些种类万千的人的心理，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，了如指掌之后，然后动笔写作的。”他接着又说小说家必须“用心理学家、科学家的耐心，宗教家的热诚，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，忘记了自我，化为故事中的角色……陪着他们作身心的探险，陪他们笑，陪他们哭，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经历的经历。”<sup>②</sup> 从这一段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傅雷对文学的看法是宏观的，多年后，在一篇讨论翻译的著名文章《翻译经验点滴》中，傅雷明确的指出：“文学既以整个人为对象，自然牵涉到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历史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音乐，以至天文地理、医学星相，无所不包。”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，创造了二千多名的人物，各行各业，包罗万象，这样的宏篇巨制，在形式及规模上，恰好符合傅雷对伟大作品的要求。

一九四四年底，傅雷初译《高老头》(Le Père Goriot)这本脍炙人口的著名译作，在一九五一年及一九六三年经过两次彻底重译，译者为此书所经历的艰辛及所付出的心血，可说是我国翻译史上

① 傅雷此文为最早论张爱玲的文章，刊载于柯灵所编《万象》杂志一九四四年五月号中。

② 同上。